

叙事文本的“间离”：陌生化与生活化之间

——析洛特曼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研究

张 杰 康 澄*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文艺理论与批评界已习惯于把文学创作看成是生活的文本化。然而，20世纪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尤利·米哈依洛维奇·洛特曼则在分析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明确提出文学创作不仅不是生活的文本化，而恰恰是文本的生活化。洛特曼运用了布莱希特提出的叙事剧的“间离效果”，具体揭示了文本生活化的实现过程。洛特曼的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和解读文学文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尤利·米哈依洛维奇·洛特曼 《叶甫盖尼·奥涅金》 间离效果

外国文学批评与欣赏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文学理论界和批评界谈论较多的文学作品往往读者面很窄，读者很难读懂，而读者面很宽的作品，文学批评界又不屑于过多地谈论。

20世纪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和符号学家尤利·米哈依洛维奇·洛特曼(1922—1993)在具体分析19世纪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曾非常准确地揭示了普希金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既能够达到创作文本的“陌生化”，又可以给读者以简单而朴实的阅读感觉。洛特曼指出，普希金正确地处理了文学文本结构的复杂性与广大读者阅读效果之间的矛盾，不再把作品结构的“文学性”与读者从该文本中获取的“生活感”对立起来，而是强调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我们看来，普希金创作的这一特点，非常类似于20世纪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提出的叙事剧的“间离效果”。洛特曼把叙事剧的“间离”方法，成功地运用到对小说的叙事文本的分析之中，这仿佛是在文学文本与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文学批评与文学欣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和启示。

一、“文学性”与“陌生化”：从生活的文本化走向文本的生活化

“文学性”与“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两个概念，早已为文学理论界普遍运用。“陌生化”是达到“文学性”的必要过程，而“文学性”又是“陌生化”的必然结果。然而，无论是“陌生化”还是“文学性”，其基础都是把文学创作视为一种“生活的文本化”。因为文学“陌生化”的前提是语言“陌生化”，而“文学性”也只是存在于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之中。

* 张杰，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俄国文学与西方美学理论的研究；康澄，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俄国文学与美学理论研究。

其实,无论是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传统文学创作,还是以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反传统文学创作,他们的基点都是把文学视为对社会生活的语言文本化,文学也就是语言文本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不同的是,前者尽可能通过语言文本来真实地呈现社会生活,减少语言自身在读者与生活之间形成的障碍,让读者能够更多获得感受生活的真实感;后者则恰恰相反,千方百计在读者与生活之间设置障碍,力图通过“陌生化”过程,让读者感受到文学语言自身的存在,以此来延长读者的审美欣赏过程,达到增强作品“文学性”的目的。

我们认为,文学创作既不是在把社会生活文本化,也不是在进行语言文字的游戏,而更主要的是在把语言文本转化成另外一些具有认识功能和欣赏价值的艺术产品。因此,如果我们还坚持认为作品的“文学性”取决于“生活的文本化”或者单纯的语言文本式转换,肯定会产生对“文学性”的误解:似乎越远离生活,越文本化,文学创作的“文学性”就越强。

洛特曼深受西方语言符号学的影响,认为文学创作的基础是语言文本,但是他没有走向纯粹的语言文本的研究,而是把语言文本看成是一种语言现实,一种生活本身。洛特曼在分析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明确指出,普希金的创作原则“不是将生活变成文本,而是将文本变成生活,不是让生活文学中得到表现,而是使文学本身成为生活”(《普希金》453)。显然,在洛特曼的研究视野中,普希金没有把文学作为对生活的一种反映,而就是生活本身;文学创作不是生活的文本化,而是文本的生活化。

如果从洛特曼的理论来看,“陌生化”不仅不是把生活文本化,而恰恰是把文本生活化的过程;“文学性”也不是生活文本化的结果,而是文本生活化的产物。正如他在“结构诗学讲义”一文中指出的,文学的材料是语言,语言结构除了能够综合各种符号信息代码和传递信息以外,还具有重大的认识功能。洛特曼把语言结构看成是认识活动的总和。他明确指出,语言本身就是第二现实。

在“艺术本文的结构”一文中,洛特曼把语言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主要是指直接表示生活或科学现象的符号体系,这种符号体系是尽可能接近所描述对象的元语言,如俄语、英语、汉语等自然语言和人工的科学语言;第二层次就是建筑在自然语言之上的交际结构与符号系统,洛特曼称之为第二性语言(或曰第二模拟系统)。文学作品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本文。洛特曼进一步指出,任何一种文学作品都是由特殊的语言来构成的。这种特殊的语言是作为第二模拟系统建立在自然语言基础之上的。这也就意味着各种文学创作都拥有自己的、固有的符号系统和自身的连接方式。这些符号系统和连接方式是为传达特殊的、依靠其他的手段所不能传达的信息而服务的。

显然,在洛特曼看来,文学创作是把语言文本转换成语言现实,转换成生活本身。这种文本的生活化是否会导致创作文本的“文学性”丧失呢?读者是否会把作品与生活等同起来呢?文学创作是否会回到写实的老路上去呢?洛特曼在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具体分析之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二、叙事文本的“间离”:陌生化与生活化之间

在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洛特曼敏锐地发现,普希金为了既使得创作文本生活化,又能够达到艺术的“陌生化”效果,采用了独特的叙事“交谈”方法。普希金本人说过:“小说需要交谈”。洛特曼以此为基础,采取了与布莱希特构建叙事剧理论的类似方法,深刻揭示出普希金怎样通过小说的戏剧化表现形式,把文学创作的生活化与“陌生化”有机地结合到

了一起。

在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代表的传统戏剧理论中,戏剧表演的主要目的是反映“真实”,演员必须生活在舞台上,真实地体验和表现生活。因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强调,在舞台与观众席之间,存在着—堵看不见的“第四堵墙”。然而,以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为代表的现代叙事剧理论,强调要打破“第四堵墙”,演员必须认识到自己是在演戏,观众也应该认识到自己是在看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布莱希特提出了表演的一个重要手段,即“间离效果”。这一表现手段就是要通过演员在表演过程中不断提醒观众保持与剧情的距离,来达到把戏剧表演的“生活化”与“陌生化”结合起来的艺术效果。

洛特曼指出,普希金在创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曾强调:“创作这部作品的立场是放弃任何的文学形式”(转引自“艺术本文的结构”434)。因为普希金认为,任何诗歌或小说的创作原则都只会使文学文本远离生活真谛,所以他要千方百计打破小说和诗歌的创作原则,来建构一个诗体小说文本。在洛特曼看来,解读《叶甫盖尼·奥涅金》,就不能够按照分析诗歌或小说的途径来进行,而要采取“间离效果”这种戏剧化的分析视角,才能揭示《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创作特征。

洛特曼认为,普希金一方面极力使作品接近生活本身,让本文模仿生活的“非艺术性”和“无结构性”;另一方面,他却又好像生怕读者忘记了他们是在阅读文学作品似的,在本文中插入了大量的对小说本文结构的设想和评价,用以不断提醒着读者,他只“是个杜撰者,小说中的主人公完全是他想象的结果”(《普希金》451)。这些内容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不是偶然出现的点缀,而是大量和普遍的现象,如第一章的第56节、第二章第60节、第三章的第11、12、13、28、41节、第四章的第32、33节、第七章的第24、55节以及第八章的第49、50、51节等。这表明它们是作家刻意和精心安排的,目的是让读者始终清醒地处于本文之外,时刻意识到文学作品的“虚构性”。其中,普希金设想了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等文学类型会如何构建这部作品,并将小说中的主人公与欧洲文学作品中的许多文学原型人物进行了比照,目的都是为了突出文学人物的虚构性。于是,小说人物形象在种种比照中不断地被否定。

普希金不仅将自己构建本文的方法和思路告诉读者,还让读者也参加到这场如何构建本文叙事的讨论中来。他将小说中人物形象发展的不同轨迹和种种可能性一一列举,呈现在读者面前。洛特曼精辟地指出,普希金将作品和人物发展的种种可能加以列举,其目的并不是要从中选取任何一种。事实上,作品也并未依照这些道路中的任何一条发展下去。普希金这样做不是为了选择,而恰恰是为了避开它们。普希金使读者确信,主人公不属于大量列举出来的文学可能性中的任何一种,他绝不是一般的文学人物,因此也就不服从任何以往的文学创作规范。这样,普希金在塑造奥涅金时就既达到了文本生活化的创作目的,同时又可以让读者感觉到艺术欣赏的“陌生化”效果。

我们认为,洛特曼深入揭示了普希金创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文本时的两个特征:一是要使作品在最大限度上贴近生活,远离文学条规;二是又要时刻提醒读者,他们正在从事文学作品的阅读活动,避免陷入阅读所产生的现实幻象之中,使读者始终能清醒地对作品中的一切进行评论和判断。洛特曼认为,虽然这两种构建本文的方式是反向的、对立的,但它们的矛盾与冲突只是表面的、外在的,实际上它们相互作用,共同构筑了作品的结构大厦,成功地实现了普希金的诗学思想,即,不再是把生活文本化,而是把本文生活化;不是让文学反映

生活,而是让文学本身生活化。

那么,这两种逆向的构建方式是如何实现这一诗学思想的呢?洛特曼从本文、作者和读者这三个基本要素的联系着手展开分析,尤其是对读者接受的维度进行了很有独创性的阐释。

三、认知模式与诗学思想:文学与生活之间

洛特曼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读者认知模式。一是普通本文的读者认知模式。洛特曼认为,我们在阅读普通的本文时,首先是完全沉浸于本文有组织的、封闭的世界中,将小说本文的世界与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加以等同。此时,本文中的人物和事件与我们头脑中以往经验的人物和事件共同作用,产生一种现实的幻象。不同的读者对本文的理解不同,正是因为每个人的经验意象和感受力是有差别的;其次,在阅读该小说本文的同时,我们不仅沉浸于小说的世界中,同时也处于本文的世界之外,是现实活动的参与者与实践者。因此,我们又会站在这个立场上对本文做出评价,将小说的本文与我们实际参与的世界进行各个方面的比较。这时,小说的本文对我们来说只是现实的一个部分,处于相对于生活的某种中间层上。在这个立场上,我们在本文中获得的已不是生活本身的片断,而是一种认知模式。

然而,洛特曼认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作品认知模式。首先,我们在阅读《叶甫盖尼·奥涅金》时,由于大量中间层的存在,在阅读的过程中不能完全沉浸于假想的艺术本文世界之中。作家不仅向我们传达了某种事物发展的进程,而且还一直在展示该事物向其他方向,甚至是逆向发展的场景,并将我们吸引到能否用其他方式来构建本文的讨论中,我们因此无法产生身处现实的幻觉;其次,当我们处于本文的立场之外来审视这部作品时,却惊讶地发现《叶甫盖尼·奥涅金》已完全脱离了文学的行列而真正进入到了现实世界中。因为普希金将生活流的真实、自然、矛盾、偶然、意外、非典型性、简单感和朴实感全部通过本文结构的复杂化体现了出来,读者觉得普希金笔下的人物已经不再是文学人物了,而是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用任何一种固有的文学类型和文学规则来阐释主人公都显得可笑和多余,奥涅金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普希金描写的恰恰是生活本身。

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强调文学描写的真实性,主张“按生活本来的面目”再现生活。普希金被视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已经是一个广为接受的事实。但是,洛特曼认为,俄国19世纪中叶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普希金的现实主义传统是完全不同的。他写道:“从19世纪中叶的现实主义美学观点看,文学创作比生活更加真实,生活,在成为了艺术之后,就好像被提高了等级,变得更加真实,更加饱含意义了”(《普希金》458)。他认为,19世纪中叶现实主义强调的是描写人物和事件发展的典型性和规律性,塑造人物形象强调的是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往往将典型作为观念的产物。而普希金的现实主义是在文学中表现真实的生活流,而不是总结生活中的规律性和典型性。

因此,洛特曼认为:“奥涅金不是‘多余人’——这本身只是一个概念,因为赫尔岑的‘聪明的无用人’是在他(奥涅金)之后出现的,只是对奥涅金做出的某种解释……”(《普希金》456)普希金的小说不是将生活规律化和典型化,而是努力接近生活本身,不同的读者可以在他的小说中找到不同的东西,做出不同的解释。洛特曼认为,正是因为普希金这种独特的作品构建方法才使《叶甫盖尼·奥涅金》自身包含了潜在的、俄罗斯整个后来小说历史的“浓缩”状态。后来的文学作品用不同的艺术视角展示着客观地存在于这部作品中的内容,整个

19 世纪的俄罗斯小说从根本上进入了《叶甫盖尼·奥涅金》之中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诠释着它。洛特曼说,普希金不仅是创作了《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本小说,而是创造了俄国小说的公式。

洛特曼通过对《叶甫盖尼·奥涅金》本文的分析做出的这一论断是极为深刻的,它使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许多文学史上似乎已有定论的重大问题,而且揭示了普希金关于艺术与生活的诗学观点,为我们重新认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立场。

注解【Notes】

参见尤·米·洛特曼：“结构诗学讲义”，《塔尔图国立师范大学学报》160(1964)：45。

参见尤·米·洛特曼：“艺术本文的结构”，《论艺术》(圣彼得堡：艺术出版社，1998年)21—22。

参见尤·米·洛特曼：“艺术本文的结构”，《论艺术》(圣彼得堡：艺术出版社，1998年)32—33。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尤·米·洛特曼：《普希金》。圣彼得堡：艺术出版社，1995年。

[. : - , 1995.]

——：“艺术本文的结构”，《论艺术》。圣彼得堡：艺术出版社，1998年。

---. : - : , 1998.

责任编辑：桑晔

misreading of the European authoritative writers , and on the other hand , it has been unceasingly reconstructed from the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by the intellectual elites.

Key words : Defoe patriarchal empire cannibals postcolonial reconstruction.

Author :Jian Changhuai is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the Chinese Department in Jimei University. His recent publication is *A Study of Post-Modern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

Title :Irony in Country Doctor

Abstract :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udy Kafka 's story Country Doctor , focusing on the verbal irony , situational irony and romantic irony which a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work. It aims to show that , in just this one short story , Kafka 's irony has extended from the micro level of linguistic rhetoric to the macro level of overall structure , character setup , theme revelation , narrative style , reader reception , etc. , covering aspects such as linguistic skills , thinking modes , cognitive scope , emotional types and expressive models. Irony is a basic feature of literature as well as the ontological existence of the world. It is an ironic view of the world and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 Kafka Country Doctor irony

Author :Yang Ji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areas are those in Oriental literature and Euro - American literature.

Title :“Verfremdung”of Narrative Texts: Lotman 's Analysis of *Eugene Onegin*

Abstract : Over a long time , there has been a tendency in the circles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to regard literary creation as textualization of life. However , while analysing the prestigious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n poet Pushkin 's poetic novel *Eugene Onegin* , the famous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ry theorist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Yury Mikhailovich Lotman definitely pointed out that literary creation was not the textual life , but on the contrary , it was lifelike text. To reveal the realization process of making texts lifelike , Lotman also exerted the Verfremdungseffekt of narrative drama , a theory which was put forward by the famous German dramatist Bertolt Brecht. Lotman 's study provides us with valuable reference to the recogn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texts.

Key words : Yury Mikhailovich Lotman *Eugene Onegin* Verfremdungseffekt

Authors :Zhang Jie is professor at the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areas ar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western aesthetic theories. **Kang Che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Ph. D. candidat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Her research areas ar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 theories.

Title : The Tragi-comic Aspects of Ibsen 's Plays

Abstract : Ibsen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founding figure of the modern European drama. His plays have shown everlasting strength and great capacity. The open structure and rich metaphorical connotation of his plays form a unique aesthetic whole. And the tragicomic feature characterizes the modernity of his plays. This article examines Ibsen 's plays from a tragicomic perspective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gicomedy since its creation. It